



“融合之都 从此大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随记

河西走廊的风尘

侯建臣

在青海的巴颜喀拉山北麓，有水东流，沿途汇集了更多的河水，便形成了跨越九省直达大海的中华母亲河——黄河。黄河滋润着两岸的土地，也滋养着华夏文明。几千年来流淌的黄河谣，成为中华大地上的千古绝唱。在黄河以西，祁连山之北，有一条狭长地带，形似走廊，被称为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公元439年，一大群人牵着马、拖儿携女离开开始等……走出河西走廊，过山涉川，挟风带尘，一路向东，朝着当时的大魏都城平城行进。这是北魏太武帝亲自带兵西征攻克凉州之后的一次大移民，这一次尽徙凉州百姓、僧侣、工匠三万多户于首都平城。

东晋末年，天下大乱，趁着晋末朝廷的混乱与无能，偏居边塞各地的少数民族鲜卑、匈奴、羯、氐、羌等纷纷登上舞台，演绎了纷纷扬扬的“五胡乱华”折子戏，且前前后后建立了约十六个大大小小的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其中从东北大兴安岭一路南下的鲜卑族的不同部落前前后后建立过若干个“国”，其中的拓

跋部落，“南迁大泽”“献帝年老，乃以位授予圣武帝，命南移……有神兽类牛，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徙所部北居长川”“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不断的迁徙，由寒冷的北地，一直向南，最终“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

就在以拓跋、慕容等鲜卑各部和以刘姓为主的匈奴等族在黄河以东的北方地区各自发展、相互交融的同时，处在黄河以西的河西走廊一带，也上演着生生死灭的大戏。河西走廊位于黄河以西，是一条形如走廊的狭长地带，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汉唐时的“丝绸之路”经征攻克凉州之后的一次大移民，这里通向中亚、西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不仅是昔日的古战场，也是甘肃著名的粮仓。这里位置比较偏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匈奴部族控制。汉朝为了控制西部地区，曾先后多次派军队西征，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也产生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留下了不少故事与传说。因为这里古称凉州，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先后由汉、匈奴、鲜卑、氐、羌等族建立过五个政权，都曾以“凉”作为国号，在历史上

分别被称为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这几个以“凉”命名的政权，有的同时存在，有的前后接替，在公元439年，随着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的大军扫灭北凉王沮渠牧犍，诸凉政权就此沉寂。

诸凉政权从前凉开始，前凉的祖先张轨做过太子侍从、皇帝顾问以及征西将军司马，是一位有涵养、有见识的汉族士大夫，可以说文武双全，在晋王室争斗不断、天下大乱之势也已初现端倪之时，他主动要求出任凉州刺史，远离祸端，可见很有远见卓识。在他治下，曾平定鲜卑族叛乱，击败过匈奴汗国的骚扰，在中原“尸满河，白骨蔽野”之时，凉州地区相对安定，各方面都得到了发展。张轨去世之后，其子张寔继任。自317年开始，凉州在实际中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割据政权。张骏、张重华父子统治时，前凉达于极盛，境内分置凉、沙、河三州，设西域长史于海头，其疆域“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北暨暨延”。后期吕光建立后凉政权，秃发乌孤建立南凉政权，李嵩建立西凉政权，沮渠蒙逊建立了北凉政权。这些政权在不断求生存、

谋发展过程中，既加强了民族融合，也努力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史称“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这些“士”，包罗了文学、艺术、儒学、佛学等各个方面，使当时的凉州一带文学、艺术、雕塑、绘画、佛教得到了全面发展，特别是由僧人主持开凿的天梯山、敦煌、榆林等地的石窟及其中的佛像、壁画等，成为穿越历史绽放夺目光彩的人类文化遗产。

而439年的人口大迁徙，在加强当时国家统治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文化的交汇。百姓的迁移，使平城成为人口近百万的大都市；文士的东移，使平城成为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而随着众多高僧大德涌向平城，使平城也随之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佛都。开始于公元460年左右的武州山石窟开凿，就是佛教东来的结果。若干年后，站在今天大同西边的武州山麓，仍然能感受到一千多年前那一群人从遥远的河西走廊带来的风尘。而巍峨雄伟的云冈大佛，作为凉州雕刻艺术的续篇，然后再由平城传到黄河以南的洛阳，让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这三大艺术明珠千年绽放！

云州区文旅又添“三喜”

本报讯(记者 冯慎)日前,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公示,经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综合评定,云州区大同火山群景区拟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唐家堡黄花旅游度假区拟确定为省级旅游度假区;唐家堡村拟入选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

近年来,云州区积极开展国家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乡村旅游村镇、自驾车旅居车营地升级建设和旅游服务水平提升工作,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不断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成功创建了一批高质量高标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文旅品牌,对于提高云州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扎实推进云州区文旅高质量发展,加速文旅康养产业升级,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双向转化通道,云州区将持续推动旅游景区提质升级创建工作,加快建设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打好旅游供给组合牌,综合开发火山、黄花、桑干河地方特色生态资源,打造京津冀乃至全国知名旅游康养目的地。不断丰富优化旅游产品业态,推动实现旅游产品多样化、互动化、联动式发展,提升文旅服务质量,加大特色营销力度,努力将云州区建设成为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高端文旅活动举办地、特色民宿打卡地。

郭建华诗集《溪月清吟》出版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近日,我市女诗人郭建华新诗集《溪月清吟》由线装书局出版。该诗集是作者从近几年创作的3000多首诗中精选出1500余首集结出版。全套诗集分上、中、下三册,是她继《相许》《别韵》《圆梦》《风雨春秋》四本书之后的人生沉淀之感悟。溪月清吟,委婉悠扬,是捧给读者的一掬映月清泉。

郭建华,笔名源静,1958年出生于山西大同,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从事媒体工作近40年。她多年来笔耕不辍,在《诗刊》《山西文学》等杂志发表大量文学作品,精选作品曾入选《山西儿童文学选》(1949—1979)《中国散文诗90年》《百年女性散文诗选》《中国诗人自选代表



作》等文集。曾获全国首届“冰心杯”“艾青杯”“全国新田园诗歌大赛”“全国当代诗人参赛赛会”等大赛奖项。

大同：游牧人的“美丽新世界”

——《大地上的山西》大同分享会侧记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大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每一次站在大同这片热土上，他都无限感慨，内心涌动着无尽的情思。他虽然不是大同人，但大同的历史文脉、人文内涵已深深地扎根于他的内心深处。“大同拥有人类游牧文明留下的最伟大的艺术宝藏，从建筑、雕塑、壁画、琉璃都有着新鲜喜悦之情、阳刚健动之气、浑博大气之志，这种气息也继承在今天的我们身上，正是缘于我们对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爱，才让我爱上大同，潜心研究大同历史文化，并在我的新书《大地上的山西》中为大同书写浓

墨重彩的一笔。”

他，就是姜剑波，一位多年深耕文化旅游的著名文化旅游学者、山西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山西秘境书坊联合创始人。《大地上的山西》是姜剑波带领创作团队历经30余年艰辛研究，用4年时间精心创作的89万字山西典藏级人文地理著作。

11月18日，姜剑波来到大同，在市图书馆“大同文化大讲堂”和古城东南邑一苇书坊作了两场《大地上的山西》分享会。两场分享会，姜剑波均以“大同：游牧人的‘美丽新世界’”为主题，详细阐述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两场分

享会虽然主题相同，但姜剑波独辟蹊径，为书友梳理出不一样的大同文脉。

姜剑波说：“位于山西高原、内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交接处的大同，历来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的最前沿。农耕人视这里为‘鸿雁出塞北，乃在无人乡’的苦寒边塞，而在游牧人眼中，这里却是充满无限可能的‘美丽新世界’，在一次次‘乌托邦’式的梦想与实践，他们奋力追求着如赫胥黎笔下‘美丽新世界’般的极致愿景，为了这个愿景，他们的目光从未离开过前进的方向。正如纪德所说：‘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知道他航向何处吗？他的目标只是前进，一直向前进。’”

在市图书馆“大同文化大讲堂”，姜剑波以大同自然地理的演变——大同上古文明的生发——大同文明融合的历程——大同游牧艺术的遗存为主线，提出并论述了“大同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游牧帝都”这个命题，阐述了游牧文明对于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重要性。

在一苇书坊，姜剑波以地理地线

——生产方式——社稷礼乐——民族融合——大同世界的逻辑链，并对比东西方文明诞生的背景、内在逻辑、不同价值、未来走向，站在现代世界背景下，向大同书友阐述重新发现并认识山西、认识大同的价值和意义，阐释“认识中国，从山西开始”这个命题的深刻立意和内在因果。现场，姜剑波全情分享，书友专注听讲。分享会结束，书友踊跃提问，热烈互动，深刻的交流碰撞出智慧火花。

围绕《大地上的山西》，姜剑波在分享中谈到，阴山余脉和恒山山脉如拱卫般围护着大同，若人凝视远方的眉眼：阴山山脉和土默川像是棱角分明、轩朗开阔的眉宇，云门山、采凉山、马铺山、洪涛山连成宽厚的上眼睑，恒山山脉成削薄的下眼睑，上、下眼睑间就是地处东亚农牧交错中心的桑干河上游盆地(广义的大同盆地)，盆地正上方镶嵌着的就是乌金色瞳仁——大同城。在姜剑波看来，大同是包容的，是开放的，文化根脉的相连相通造就了大同的山西独有的内涵。

现场还展示了这部760页、重达两公斤的煌煌巨著。书中精美珍贵的67幅手绘地图，150位摄影师拍摄的361幅山西风光图片，堪称山西文旅“大片”，令人赞叹。姜剑波说，《大地上的山西》以“天、地、神、人”为主脉络，融合了自然、土地、精神、社会四个空间，精选了山西的28个人文地理坐标为星宿，次第点亮中华文明探源的曙光，鞭辟入里地梳理、论证和阐释了“认识中国，从山西开始”的文化脉络。而涉及大同篇章，《大地上的山西》在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和景区概念后，重新照亮了大地上的山西，重构了以山西为基点的“古中国”版图：如“大同火山群”一篇，以火山群为切入，实则为引出“汾渭裂谷”这个宏

大地理概念。书中提及的坐标虽然没有按行政区划分区归类，但28个人文地理坐标犹如28星宿，涵盖全省11市。行政归属只是一个地域标志，这些地域标志之间却有着一定的文化联系。比如《五台山》《系舟山》《大雁门》三篇，其实太行八陲、大同火山群、恒山等都与其紧密关联；看《白银谷》一篇，实则太行八陲、大同、太原、白银谷、杏花村、张壁、碛口、霍山——广胜寺、沁河古堡群、古建金三角、河东盐池等篇都深度涉及晋商文化。书中还附有1.2米《云冈石窟全景》手绘长卷，细腻生动，全面展示了云冈石窟独特的文化内涵。

姜剑波说，追溯大同历史，回望长城内外，边疆以外，是部落联盟制度；边疆以内，是封建世袭制度。两种制度，有冲突，有交流，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大同，从秦汉至明清，每朝每代的发展演进都给我们留下了两种制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足迹。

翻开《大地上的山西》，大同像一幅壮美的“画轴”，向着远方，向着新的梦想迈进……

大同市歌舞剧院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莺路堡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民间视听
 抖音号：76804949657
 大同今昔对比
 让城市留下记忆 让人们记住乡愁

赏云冈石刻 诚千古稀见

——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赞誉云冈石刻艺术略记

朱孟麟

编者按

本文是作者拜读当代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后有感而作。钱穆先生在90年前到访大同，参观云冈石窟之后感叹“诚千

古所稀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寥寥数语，给予了云冈石窟以极高的评价。此文是研究云冈石窟名人访问资料的又一补充。

钱穆先生(1895—1990)，字宾四，晚号素书老人，江苏无锡人，是中国近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与吕思勉先生、陈垣先生、陈寅恪先生并誉为民国当代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曾任任齐鲁大学、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多所大学教授，晚年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新亚书院。钱穆先生一生著作颇丰，为后世留下了1500余万字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共56类凡54卷册。《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先生的代表作，而《国史大纲》一书钱穆先生则用温情和敬意阐述了华夏国史，被史学界公推

为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

钱穆先生平生喜好旅游，一生中多次游历海内外，参访名胜古迹。1930年秋，36岁的钱穆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邀，来到北京大学任教，直到1937年冬，辗转南下任西南联大教授，整整在京7年。如钱穆先生自述：“余在北大凡7年，曾屡次出游……远游凡四次。”钱穆先生在北京期间的第一次远游是在1933年春季，那一年，钱穆先生任督队，带领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沿津浦路游历了泰安、济南和曲阜。第三次远游，钱穆先生独自一人去了汉口、九江游览了庐山，时间是在1936年的夏天。1937年春，钱

穆先生第四次远游，到访了开封、洛阳和西安。

关于第二次远游，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章节中写道：“第二次游平绥路，大同、绥远以至包头。不忆在何年，同游者皆清华师生。”可以看出，钱穆先生的第二次远游是沿着平绥铁路游历了大同、呼和浩特(当时称绥远)和包头三个地方。钱穆先生竟忘记了此次出游的具体时间。我们从钱穆先生自述的第一次远游是1933年春，第三次远游是1936年夏天来分析，钱穆先生的大同绥远包头之行应该在1934年或1935年这两年当中的某一年期间完成的。

我特别注意到了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关于到访大同的描述。钱穆先生说：“先至大同，赏其云冈石刻，诚千古所稀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亦一可见也。”寥寥数语，钱穆先生用精辟到位的29个字的概述，给予了云冈石窟以极高的评价。钱穆先生拜赏了云冈石窟后，认为云冈石窟为举世少见的艺术珍品。确实实实在在具有千古存世的价值。钱穆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云冈石

窟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其非中国文化嫡传。”一语中的，钱穆先生认为，观赏云冈石窟，你可感受到其并非都是传统中国元素的雕刻，而是融入了大量外来文化的特质和内容，云冈石窟是中西文化的结晶。近年来，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也证明了钱穆先生所言之正确。作为世界顶级的佛教雕刻艺术，云冈石窟既是中国更是世界的艺术瑰宝。云冈石窟有二十窟露天大佛妙相传神的绝代芳华；有古希腊大卫·科波菲尔鼻尖的直挺俊秀；有爱奥尼亚雕柱的柔美雅致；有中华古建一斗三升及人字拱的华美瑰丽；有昙曜五窟汉民族大写字雕刻的宏壮凝练；有健陀罗风格的大窟、大像、弥勒大佛的神韵风采；更有流行于北魏时期诞生在马背之上的拓跋服饰的飘逸雕饰等等。云冈石窟的雕刻处处都体现出中外文化融合的痕迹。

在大同期间，钱穆先生一行“又在城中一榻，偕三四人午餐。”先生说：“据云此楼系大明正德皇帝在梅龙镇遇见李凤姐之原址，信否无可考。然余屡听游龙戏凤平剧，在此一餐，亦若特具佳味。”我以为，钱穆先生当



年在城内午餐的酒楼应是大同城九楼巷内著名的凤临阁，对凤临阁的饮食，钱穆先生给予了“特具佳味”的好评。

1937年春，钱穆先生第四次远游，与清华师生游览了开封、洛阳和西安。对洛阳的行程感受，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7篇章中写道：“洛阳萧条……游伊阙(洛阳别称)爱其江山之美及石刻之典雅，较之大同云冈可谓风迥殊，典型自别。”钱穆先生认为云冈石窟和龙

门石窟雕刻风格迥殊。我以为多元融合、中外合璧的云冈雕刻风格与大唐汉化为主的龙门雕刻风格是有截然不同的之处。

立冬之日，我宅于平城诗韵中捧读钱穆先生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读到了钱穆先生在90年前到访大同，参观云冈的内容和感受，很是感慨。钱穆先生是我敬仰的一代大家，今写此拙文，以表达我对先生由衷的敬意，也补云冈石窟研究名人访问资料一段空白。